

ZXFK 红色记忆

张健

邓小平与霍步青在瑞金

“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郭兵主编的《红都瑞金》记载:1931年8月,中共瑞金县委由中共闽西特委和中共赣东特委双重领导。县委书记李添富是中共闽西特委派来的。中共赣东特委从宁都县迁到瑞金后,特委书记谢唯俊才了解到李添富在全县大肃“社会民主党”一事,并发现其中存在严重问题,需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迅速扭转局面,以应对敌军可能对瑞金发起的进攻。正好邓小平此时来到这里。中共中央苏区局巡视员霍步青是邓小平的老熟人,对邓小平非常了解,于是经与谢唯俊等共同研究,决定将迅速纠正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错误这一重任,交给邓小平。中共赣东特委委任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要金维映配合邓小平工作。

上文说到的霍步青,是恭江革命烈士周恩来赞扬过的、黄埔军校“霍氏三杰”之一。那么,他为什么与邓小平是“老熟人”、怎么会到邓小平非常了解呢?他又是在什么背景下推荐,并与赣东特委共同决定委任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这一决定对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人应该弄清楚的。值此烈士们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之际,将其挖掘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告慰烈士英灵于九泉之下。

冲出虎口 霍步青瑞金巡视

霍步青,原名霍仁云,1902年2月生于恭江县蒲河乡温泉村福泉庄(今永城镇)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加入共青团,与恭江革命志士邹进贤、霍绍文等同志一起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以后的恭江早期人民革命斗争。

1925年秋,霍步青与四弟霍坤鏞、堂叔霍霖如,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学习、战斗。三人表现出色,被周恩来赞誉“霍氏三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霍步青奉命于1927年4月底转移至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任中共

央组织部接待科科长、总交通。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的叛变,迫使他离开上海为止,在长达4年多的地下斗争中,他精明能干、机智勇敢、工作积极,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警特以及革命的叛徒,进行殊死斗争,在白色恐怖下,凭着对党的忠诚,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任务,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再次得到周恩来的信任和称赞。

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的出卖,情况万分紧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凡是有可能被顾顺章知道或了解的机关和人员开始大转移。

第一次,组织上决定让霍步青赴苏

联学习,但是,由于秘密交通线出了问题,联络不上,路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没能实现。

第二次,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其到湘鄂赣苏区工作,于是他告别妻子朱月倩和两个幼女,踏上征程。不料,在途中被叛徒顾顺章发现并密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过望,认为抓住霍步青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总交通,就会把共产党的所有机构一网打尽,因此,派了大量特务跟踪、追捕。所幸,周恩来及时获悉了此情报,立即派人把霍步青秘密召回上海。朱月倩在《青天赤帜》一书中回忆道:“那天晚上我听见敲门,

一看是周恩来。周通知我转移,并商量如何保障我丈夫霍步青的安全,那时他刚乘船离沪赴汉。正是由于周恩来的紧急安排,他才得以中途下船,避免了在武汉遇险。”

第三次,中共中央决定让他改赴中央苏区工作。1931年夏,霍步青终于冲出虎狼口,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苏区局巡视员。

1931年8月7日,霍步青与赣东特委(1931年6月组建,管辖瑞金、宜黄、宁都、广昌、乐安、南丰等县)书记谢唯俊一起,到达瑞金县巡视工作。

扭转局面 邓小平临危受命

此时,瑞金的县委书记名叫李添富,此人热衷于在革命队伍中清查“社会民主党”,并亲自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将一些出身地主、富农家庭,或者对他那一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通通指责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随意逮捕,严刑逼供,予以处决。全县被其杀害的有400多人,以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局势一片混乱。

霍步青在8月8日给中央的《中共赣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党的情况(1931年8月8日写于瑞金城)》中说:“党及政权因为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600余人现在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李添富在全县党组织内部怀疑一切,滥杀无辜,把整个瑞金县党组织几乎搞垮、搞瘫,造成全县思想上的大混乱,严重削弱了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形象。肃反运动仅仅两个月,瑞金的革命形势

由好变坏急转直下。邓小平同志在《我的自述》中回忆说:“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霍步青和邓小平是老朋友。早在1929年,他们就同在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邓小平、张锡媛夫妇和霍步青、朱月倩夫妇六个人,是同一个党小组的中共党员,经常在一起开展组织活动,研究工作。霍步青在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两人在工作上常有联系,所以相互非常了解。霍步青也非常敬佩邓小平的工作能力。此时,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相见,“令邓小平感到意外”,分外亲热。

于是,霍步青向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相互了解之后,他们都对瑞金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霍步青将自己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向邓小平和金维映作了介绍,谢唯俊也认为李添富他们搞“社会民主党”存在严重问题,必须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不然的话,不用敌人来打,自己就会垮掉。

“在这种情况下,霍步青和谢唯俊等商定,由邓小平取代李添富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为方便起见,让邓小平先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行活动。”(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第194页)于是,27岁的邓小平二话没说,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一定不负众望,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霍步青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来此任务,一方面推进宁南工作援助三次大战(注:即第三次反围剿),一方面整理瑞金工作。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党及政权,发展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彻底重新分配土地。”后来,瑞金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正是按这样的要求在做。

邓小平带着金维映和稍后到来的余泽鸿等人,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很快掌握了李添富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指鹿为马、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而后,他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在会

上,邓小平鼓励大家就前一阶段瑞金的肃反工作发表意见,在他的鼓励与支持下,一些党员打消了顾虑,纷纷揭发李添富等人乱捕乱杀党员干部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代表民意,以赣东特委的名义,罢免了李添富县委书记和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将其逮捕、公审。由于民愤极大,当场对李添富执行了枪决,同时,宣布释放所有被怀疑为“社党分子”而遭关押的200多人。这一系列快刀斩乱麻的行动,驱散了笼罩在瑞金上空的阴霾,瑞金混乱的局势得以迅速稳定。

此后,新的县委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建立和整顿了县、区、乡三级党组织和区、乡苏维埃政权;举办了积极分子培训班,加紧培训一批本地干部;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瑞金这一革命老区,各个方面的工作很快有了新的起色。

此时的霍步青,已就任60公里以外、新设立的彭泽县县委书记。

“一苏大”召开 瑞金成为“红都”

午时分,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领导,来到了瑞金叶坪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进福建的长汀县,准备在那里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筹粮筹款,休整补充部队;二是筹备在11月7日召开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到叶坪村后,他们决定在此暂作休息,于当晚赶到长汀县。

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在叶坪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中共瑞金县

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关于瑞金和赣东苏区情况的汇报。从邓小平的汇报中,毛泽东了解到瑞金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并全面分配了土地。

他认为,邓小平在短短的时间内打开了瑞金的工作局面,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同,是一位善于驾驭时局发展、有着很强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

而正是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改变主意,下决心放弃原来准备在福建长汀召开“一苏大”的想法,改定在瑞

金召开“一苏大”,并将临时中央政府改设在瑞金叶坪村。

1931年11月7日,令国民党政府震惊、令全国劳苦工农大众振奋的大事——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召开,大会开得非常成功。11月27日,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樟树林里,毛泽东正式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这个时候起,人们称毛泽东为“毛主席”。最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ZXFK 寻踪

何莉

小楼藏春秋:

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

在渝半岛网红景点洪崖洞的对面,静静地伫立着一栋中西结合、外墙已被爬山虎“染”成绿色的小楼,这就是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苏、美、英、法等国家的驻华使馆亦先后移设到此。1938年1月19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奥莱斯斯基偕苏联塔斯通讯社社长罗果夫及秘书梅拉美德等乘机抵达重庆,于1月23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苏联大使馆是最早迁渝的外国驻华使馆。

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展开,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心之一。因处于战争时期,不少国家在大使馆之外,都另设武官处。苏联大使馆亦在靠近嘉陵江边的炮台街24号(今沧白路69号)设立了武官处。这栋灰黑色、三室一厅的小楼,是重庆武器修理所专家沈芷仁于1936年修建的住所,

又名沈芷仁公馆。沈芷仁曾留学法国,对制药、电气、机械等具有丰富经验,曾在刘湘创办的兵工厂供职。1938年苏联大使馆迁渝后,沈将公馆让给其武官处使用。

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在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处任少将武官,同时还担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重庆期间,他一直居住在这栋小楼里。崔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杰出的军事家、外交家,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前线的主要指挥者,在库尔斯克、柏林等著名战役中建立了功勋,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晋升为元帅。崔可夫年轻时曾多次到过中国,熟悉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工作过。在任苏联大使馆武官和军事顾问时,他积极为中国抗战出谋划策,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做出了贡献。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到武官处会见崔



可夫,向他通报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情况。崔可夫随即向蒋介石表示了本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关切,并向国民政府方面的军事负责人何应钦、白崇禧陈词皖南事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重庆解放后,该处一直是重庆市文化局办公用房,后又作为重庆市越剧团、艺术创作中心的办公场地。因年久失修,房屋

损毁严重,2012年,由其管理使用单位——重庆市演艺集团投入500余万元进行修缮,修缮时采用传统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貌。2009年,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公布为重庆市抗战遗址文物保护单位并挂牌保护;2013年3月,作为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的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丰子恺 山城品黄酒

ZXFK 名人轶事

范国明

战乱之时,丰子恺避居重庆,以卖画鬻字为生,时常辗转于川渝黔桂。战事之频仍、生活之拮据、笔耕之辛劳,这时酒就成了解忧助乐的伴侣。这位艺术大师时常念恋着家乡的绍兴黄酒,而山河破碎流亡他乡之人又怎敢奢望时常痛饮家乡美酒呢?有一天,他在重庆一家酒店中发现了绍酒,遂举杯畅饮。饮罢方知此酒并非来自家乡,而是渝人仿造的“允丰正”黄酒。此酒纯正清香,上口舒适,竟不减绍酒。从此,他与这“渝人仿造”的“允丰正”结下了不解之缘。1944年中秋,丰子恺先生酒兴大发,同家人一起举杯同饮,酒兴正酣时,诗兴忽起,欣然挥笔,作《贺新凉》一曲:

七载飘零久,喜巴山客里中秋,全家叙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故园焦土蹂躏后,只相思江南风物,旧时亲友。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弄搔手。

丰子恺对允丰正黄酒情有独钟,往往饮后情绪悠然,舒适畅快,诗绪翻飞。因此,他不时邀请茅盾、叶圣陶、傅彬然等文友小酌,酒助文思,挥毫泼墨,吟诗作画。允丰正黄酒成了他每日必饮的琼浆,且看《丰子恺文集》中有关他在渝饮酒的描述:

“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酌的是‘渝酒’,即重庆人仿造的黄酒。”“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促膝谈心,倘添上各人一杯黄酒在手,活兴一定更浓,吃到三杯,心窗洞开,真情挚语,娓娓而来。古人所谓‘酒三味’,即在于此。”“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又作为家庭聚会的助兴品。……我的晚酌,意不在酒,是要借饮酒来延长晚餐的时间,增加晚餐的兴味。”“我在晚酌中眼看东京的大轰炸,墨索里尼的被杀,德国的败亡,独山的收复,直到波士坦宣言的发出,八月十四夜日本无条件投降。我的酒味越吃越美,我的酒量是越吃越大,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

先生喜爱允丰正黄酒,自然要关心允丰正的来历,他向一老者打听。“允丰正黄酒出自清朝道光年间,重庆大小衙门的文案几乎清一色是绍兴师爷,他们入川当差,苦无绍酒可饮。一位绍兴籍的府台韩四大人找到一家字号叫‘允丰正’的作坊老板杨应龙,向他传授酿造绍酒的技术,但是其酒色香味远不及绍酒。一天夜里,杨应龙梦见一白胡子老道人指点配方,他醒来如法炮制,于是有了这风味独特的渝制黄酒,此后,允丰正酒名扬大后方,行销全国,生意越做越红火。”

丰子恺先生倒不是对这神仙配方的传说多么感兴趣,对他更有意义的是流亡异乡居然能喝到家乡的美酒,一杯黄酒,劳顿骤消,诗情倍增,灵感顿起,允丰正助他创作出大量的艺术精品,增添了无穷的喜悦。丰子恺先生说,他的胜利的喜悦,是吃酒吃出来的,世界的美酒,无过于这渝人仿造的“允丰正”了。

谁能想象,如今位于九龙坡西彭镇的允丰正酒厂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其允丰正黄酒已是闻名遐迩,甘甜了无数人的餐桌。

ZXFK 重庆往事

尹明善

门神

“左边门神秦叔宝,右边门神尉迟恭。”本文说的不是风俗流传的这两位尊神,而是左边门神川盐银行大楼(今重庆饭店)、右边门神美丰银行大楼,这两尊旧重庆城的门神。它俩在渝中区新华路两旁对望,高高大大,威风凛凛,保境安民。

高不见顶

我上重庆城前,父母长辈多次给我讲过重庆城的川盐银行和美丰银行高耸入云,望不见顶。抬头仰望,帽儿都要仰落。

1947年春,我随二哥来到重庆。头天住二哥教书的南岸弹子石文德女中,第二天我哥就带我进城。弹子石轮渡进城船靠千厮门码头。爬上坡到达的第一条马路就是新华路。

“你不是想看川盐银行吗?就在马路斜对面,你看!”我二哥对我说。我不顾一切横穿马路跑向我梦想的大楼,幸好那时车辆很少。啊,好高!我抬头望不见顶,下意识地摸摸头,看帽子是不是仰掉了。退后一丈多远,才勉强看到了它的顶部,真有刺破青天的感觉!

美丰银行建于1935年,高七层,创当时重庆建筑的最高纪录。晚建一年的川盐银行,本来也七层,为了超过美丰银行,加了两层“宝顶”,创新高。重庆房屋的最高纪录由他们保持了二十多年。

坚不可摧

我被大楼底层的外墙吸引,走近抚摸它,光滑坚硬,黑油油,亮锃锃的,照得见人。我哥告诉我,川盐、美丰两幢大楼都是钢筋水泥(时称)建筑。川盐底部一二层是黑色大理石外墙,三层及以上外墙呈黄褐色,对面的美丰银行则通体全黑。“你退后看,就能看出这幢大楼有多威风。”我二哥说。我便后退了两丈多。但见大楼墙体表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小坑。小坑面积比拳头略大,深约半寸,坑口缺缺昂昂(“昂”念一声,重庆土语)。我二哥说:“那是日本飞机的机关炮扫射的,但是打不透大楼钢筋水泥墙。重庆大轰炸连续七八年,整个重庆城被炸得稀巴烂,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街道。日本飞机多次轰炸过川盐、美丰两幢大楼,墙也轰不透,楼也炸不垮。只有川盐大楼顶部的‘宝顶’,被炸塌了一小块。真是坚不可摧,何等威风!”

保境安民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过重庆218次,出动过9000多架次飞机。川盐、美丰两幢大楼的地下室,是全市最安全的防空洞之一。它们保护了自己的员工免遭轰炸,还庇护了许多附近的居民。

1949年9月2日,重庆遭受了空前规模的大火灾,史称“九二火灾”。那时我在南岸四公里读书,当天下午四点钟便看见市中区上空浓烟滚滚,那阵仗吓坏了老师、学生。大火一直烧到深夜,入夜后城市上空还见火花闪闪。第二天我进城去看究竟。但见朝天门、千厮门、陕西街一带几乎被烧光了,据说一共烧掉了39条街。走到川盐、美丰两幢银行大楼面前,我惊呆了!从两幢大楼向朝天门、千厮门方向下行,几乎被烧成一片瓦砾,到处是焦糊味,许多地方还余烟缭绕。而当年炸不垮的两幢大楼,纹丝不动地屹立在火灾废墟上。沿两幢大楼上行的房屋街道也全都安然无恙。是两大楼阻挡了大火向上蔓延,保住了成千上万间房屋,庇护了数以万计的重庆居民免受大火的肆虐!

在少年我的心中,这两幢楼是神一样的存在。